

当代中国 德治 研究

DANGDAI ZHONGGUO DEZHI YANJIU

德治的路径、功能与理论框架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 德治与法治
结合的科学精神 德治的价值诉求 权力配置德性 制度安排伦理
行政行为道德 公民道德 私人美德 民族精神 执政为民与和谐社会

李兰芬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社会科学十五重点基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
苏州大学211人文社科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当代中国 德治 研究

DANGDAI ZHONGGUO
DEZHI YANJIU

李兰芬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德治研究/李兰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01-006763-6

I. 当… II. 李… III. 社会公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D6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386 号

当代中国德治研究

DANGDAI ZHONGGUO DEZHI YANJIU

李兰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2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763-6 定价:4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ontents

001

引 论 德治的路径、功能与理论框架

/001

一、路径开新:统治·治理·善治/
004

二、功能定位:构建社会主义道德
体系/012

三、理论框架:一体二翼六卦/021

基本理论篇

第一章 中西方德治思想比较 /027

一、中西方德治内涵比较/028

二、中西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异
同/034

三、中西方德治的文化基础/038

第二章 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 /042

- 一、德治、法治:学界的观点/043
- 二、德治、法治:科学诠释的基础/
050
- 三、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何以可能/
054

第三章 德治的价值诉求 /060

- 一、德治价值的追问依据/061
 - (一)“德治问题”/062
 - (二)谁为德治主体/063
- 二、善政:政治与伦理/072
 - (一)何为善政/073
 - (二)政治与伦理关系考辨/074
- 三、善的社会:国家与社会/111
 - (一)何为“善的社会”/111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厘定/
*116

善政篇

第四章 权力配置德性 /137

- 一、权力与权力配置/138
 - (一) 权力与权力特性/139
 - (二) 权力配置: 实质及其配置原则/145
- 二、权力配置模式考辨/155
 - (一) 权力配置模式/156
 - (二) 权力配置模式变迁机理/160
- 三、权力配置德性实践/161
 - (一) 我国权力配置的基本模式/162
 - (二) 权力配置德性的正确路径/163

第五章

制度安排伦理 / 170

- 一、制度与制度伦理/171
 - (一) 制度概念分析/171
 - (二) 制度的伦理特性与制度的合理性/176
 - (三) 制度伦理与伦理一般/193
 - (四) 制度伦理与个体德性/196
- 二、制度安排的社会基础/199

- (一) 市场经济和公共秩序/199
- (二)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需求/
202

- (三) 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205

三、制度安排的价值视野/209

- (一) 构筑德治的保障机制:制度
安排的价值功能/210
- (二) 公平与效率的并重同构:制
度安排的价值标准/217
- (三) 人性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和
谐:制度安排的价值追求/
225

第六章 行政行为道德 /233

一、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道德/234

- (一) 行政行为与行政主体/234
- (二) 行政行为道德及其价值
冲突/237

二、行政自由裁量的伦理评价/252

- (一) 行政自由裁量及行政自由
裁量权/253
- (二) 行政自由裁量的伦理

困境/256

(三)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化/
258

三、行政忠诚与行政行为责任/260

(一)行政忠诚:行政行为责任的
前提/261

(二)公务员行政职业道德:问题
及其实质/262

(三)公务员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责任伦理的视阈/264

005

善的社会篇

第七章 公民道德 /279

一、公民身份及其实质/279

(一)公民身份/280

(二)权责一致:公民身份的实
质/286

二、公民道德的形成及其结构/291

(一)公民伦理与公民道德:辩证
意义分析/291

(二) 公民道德的形成:前提批判
与根源考察/294

(三) 公民道德的结构:三维动态
解剖/302

三、公民道德建设理念与实施路
径/309

(一) 自律与他律的二重性关系/
310

(二) 制度保障、教育与内省/317

第八章 私人美德 /330

一、美德与私人美德/331

(一) 美德概念的历史探源/331

(二) 美德的类型划分/333

(三) 私人美德的价值旨归、构成
及其特点/337

二、中西方私人美德传统/345

(一) 中国私人美德传统的时代
变迁/345

(二) 西方私人美德传统的历史
谱系/350

(三) 私人美德的科学解读/356

三、私人美德的当代形态/360	
(一)中西方传统中的私人美德养成说/360	
(二)和谐:私人美德的当代形态/363	
四、和谐美德的养成/366	
(一)私人美德的养成传统/367	
(二)和谐美德的养成路径/371	
(三)习惯养成的道德价值和心智历程/374	

第九章

民族精神 /384

一、民族精神与公共价值/385	
(一)理性危机与公共价值/385	
(二)作为价值共识的民族精神/392	
二、民族精神与社会信仰/404	
(一)社会信仰:概念与结构/405	
(二)民族精神:一种社会信仰/411	
三、民族精神与社会资本/414	

	(一) 社会资本: 内涵及其功能/ 415
	(二)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民族精 神建设/424
结 语	执政为民与和谐社会 /428
	一、执政为民: 善政的理念与实践/ 429
	二、和谐社会: 善的社会的当代形 态/430
参考文献	/433
后 记	/439

引论 德治的路径、功能 与理论框架

001

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的全球传播,经济的空前繁荣,整个世界迎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局面以来,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战略宣言,预示着中国当代社会正在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备、社会秩序良好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新的思维探索、理论创新,铸造新的民族精神的历史时空。“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个民族

的前途。”^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党综观全局、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作出的历史性重大抉择。

苏联与东欧剧变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多极化的时代。一种在经济与政治层面上依然是实力第一的多极化时代引发的世界性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组织网络的转型日渐凸显。“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② 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理论双重推进带来整体观念革新洗礼的中华民族日渐步入传统治理理论的终结而新的治理理论尚未成型的社会治理紧张期或曰危机期——传统单一单轨的治理方略已不足以解释、安顿或指导社会结构转型了的当代中国。面对经济发展和物质丰裕给人以享受和灾难并存的局面,关注社会治理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我们争取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目标。而“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③。中共十六大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总结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13 年成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分宝贵的十大经验之一的学理价值也在于此。^④ 对应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主体精神系统的集中表征,法律与道德则构成精神文明系统的底蕴和核心。“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⑤ 人类依据道德与法律维护、规范、评价人们思想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5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6 页。

③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苟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39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34 页。

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6 页。

和行为的现实活动即为德治与法治。以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作为合理监控和调节保障使社会成员得以维系在一起的资本动员力量——共同体的权利和权力——的两大相互渗透的支持系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①,积极、主动地探索、推进其执政范式的转换,以有效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向新的时代迈进的成功实践和执政能力。所谓执政范式(治国模式)主要是指通过一定法律的、道德的规则、准则、价值观念等以规范、整合、协调、引导社会成员利益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治理系统。“不谋全局则不足以谋一城”,没有德治与法治的结合,道德与法律各自局部的功能则不能真正得到发挥和实现。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既顺应了民意,也符合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着眼于完成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将“以德治国”写入了新党章的“总纲”,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治党管党水平,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发展的临界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从人均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多事之秋。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中国社会就会进入一个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便可能会出现“拉美化”的局面。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在“拉美化”的病态中,人均 GDP 或许不低,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动荡不安。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诟病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意义诸多: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以防止社会发展失调,不断提高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避免重蹈覆辙,才能达至成功的时代使命。

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既是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分析图式,也是人类文明思想史的璀璨瑰宝,它们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学科视阈中各不相同,其作用和意义表现各异,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以德治国”从它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种合理合法性的身份焦虑之中。

一、路径开新:统治·治理·善治

作为一个从事伦理学教学科研的工作者,理应更本分地从道德

建设角度去思考德治问题,而不应该写下这样一个复杂的跨学科题目。但伦理学视角的道德建设对德治系统的审视总难周全,其他视角也各自难免存在不同学科的前见或偏见。这既关涉以德治国研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研究本课题的价值诉求。笔者以为,研究以德治国最为关心的不止是伦理学学科专业的道德“表态”或思想“站队”,而是更关心我们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的“理解”。德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不仅仅是伦理学家或其他什么学家的实践,其构成同时需要“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①三种知识。按传统的知识分类法,德治似乎更应归入实践理性。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实践理性具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们用以作出实际选择或伦理选择的一些方法;二是指大量依据研究或努力的特殊领域内的传统来获得结论的一种方法论;三是指使不轻信的人们对不能为逻辑或精密观察所证明的事物可以形成确信的一些方法。^②在本书关于德治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知识结构,既需要富有思辨理性的道德哲学,也需要充满实践理性的治理理论,更需要融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为一体的德治技艺。本书研究要形成相对正确的观点已属不易,而将这些观点转化为可操作的技艺则更难,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环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改变世界”的治理活动理应包括在德治课题研究之中并占据研究最本质的方面。以德治国“何以可能、何以有效”地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就构成德治课题的经典“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以德治国应该做的事情类型;二是以德治国的自我形象。

根据现代制度演进理论,任何制度演进均由其“路径依赖”,即受传统、信仰、既有体制的制约。那么,一切创新则既是传统路径的突破,又是新型路径的开创。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汉斯

① 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知识的分类。

②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又将“路径依赖”解读为组织失败原因之一。“路径开新”则是对汉斯逻辑的超越而为以德治国合理合法性的理论结构和实践框架寻找的时代境遇或语境平台。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文脉及其发展趋势,作为我们探究“以德治国”合理合法性的时代境遇或语境平台蕴涵了现代德治的两大意蕴:一是治理理论为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支持;二是现代治理对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提出的规范性要求。由此可说,倡导德治的价值并不在于德治本身,而在于对中国社会治理之愿景的关切。

统治、治理与善治是三个互有关联而又分属于不同价值层次的范畴,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统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的公共机构(政府)的权力,实现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管理过程;治理则是旨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善治是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人类政治发展追求的理想目标,它是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理想的治理模式。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统治与治理的不同点则在于:首先,主体与权威不同,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现代的公司、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没有政府的统治,也有可能有序运行,但公共机构的缺席绝对会导致组织的混乱。其次,管理过程中统治与治理的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